

紀念飛歷奇百年誕

文學社會學視域下的飛歷奇——自成一派的作家

祖些·卡路士·韋南肖* 著，黃曉蓉** 譯

摘要 飛歷奇至今仍是澳門土生作家中最多產的一位。在所有以澳門為寫作中心的作家中，他是最具澳門歷史和文化特色的人物。本文主要採用文學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分析飛歷奇的作品，並將其與澳門文學傳統作對比，又嘗試應用當下人文社科領域中流行的“後殖民範式”作分析。鑑於澳門地區的特殊性及其對作家寫作過程的影響，本文將進一步探討以這一範式來分析飛歷奇文學作品的適用性。飛歷奇的寫作風格難以歸類為任何一種文學傳統流派，故其可謂全球文學領域中自成一派的一位作家。

關鍵詞 土生文學；文學社會學；葡語系國家；後殖民主義

引言

飛歷奇是澳門最多產的土生作家，也是葡語文中學中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他的作品至少涵蓋四種文學體裁（或次體裁）：長篇小說、短篇小說、編年散文和回憶錄。當中包括三部長篇小說《愛情與小腳趾》（1986年）和《大辮子的誘惑》（1993年）及遺作《朵斯姑娘》（2012年），短篇小說集《南灣》（1978年）、以回憶和自傳為主題的作品集《望廈》（1998年），以及編年散文集《澳門電影：自二十世紀初至三十年代》（2010年）。除了小說之外，飛歷奇常以混合體裁的形式進行寫作。總體而言，飛氏的作品皆以作者生活且熟知的城市——澳門，作為中心主題，因而造就出飛歷奇這位卓越的“澳門作家”。“澳門人”（Macaense）一詞，在狹義上是指十六世紀以來在澳門形成的一個種族及文化混合社

* 祖些·卡路士·韋南肖（José Carlos Venâncio），美茵茨大學（Johannes Gutenberg-Universität Mainz）社會學博士，貝拉英特拉大學（Universidade da Beira Interior）社會學系退休正教授，現任米尼奧大學（Universidade do Minho）傳播與社會研究中心研究員。

** 黃曉蓉，葡萄牙天主教大學（Universidade Católica Portuguesa）對外葡語碩士，現任《文化雜誌》（外文版）助理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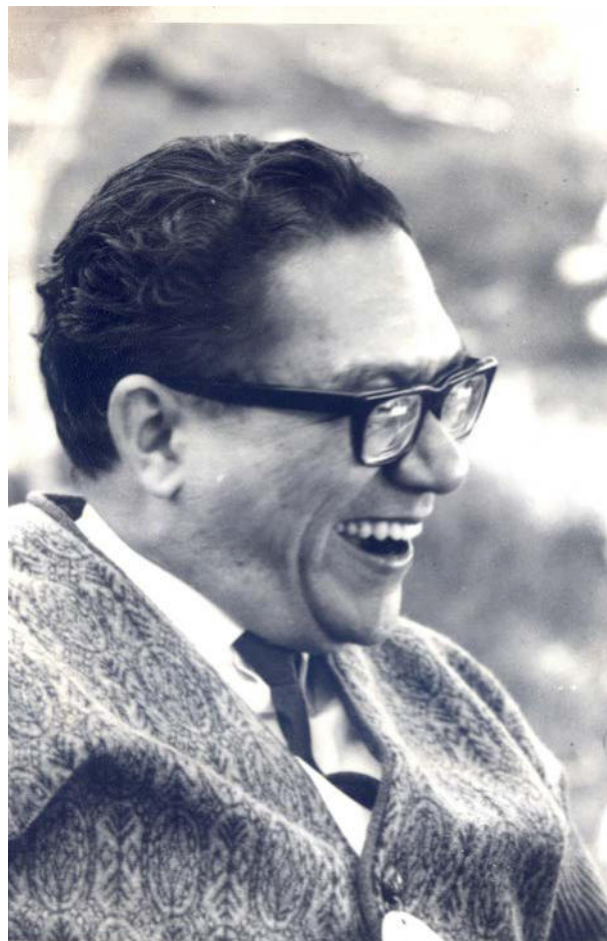


圖1. 飛歷奇擔任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組織委員會主席時留影，1968年。（圖片來源：Senna Fernandes 家族檔案）

群，當中至少包括三個族裔：葡萄牙人、華人及來自南亞地區的非華人。他們除了因信奉天主教而擁有相近的宗教價值觀、生活經驗和習慣，還演化出一種被用以加強及團結社群身份的克里奧爾混合語（crioulo）¹——土生土語（Patuá）。

一、文學場域與慣習

澳門葡語圖書市場的弱點在於受到人口數量（讀者數量）的限制，以及各個居澳社群之間存在區隔。這主要源於他們難以充分理解彼此使用的語言（包括書面和口頭用語），因此澳門的華人作家很少與土生或居澳的葡萄牙作家進行思想、美學經驗和品味方面的文學交流。關於這一方面的缺失，筆者在一次訪談中得到飛歷奇本人的承認。²故此，筆者認為難以僅僅根據所謂“澳門文學”的脈絡來評價飛氏的作品，必須將其置於一個更廣泛的領域進行討論。因此，本文將嘗試引入另外兩條路徑對飛歷奇的作品作出定位和分析：其一是東方主義傾向的葡萄牙文學傳統；其二是葡語系地區的文學傳統，即那些曾在葡萄牙管治下的非葡語母語人士的葡語寫作活動。

時至今日，對於這些文學傳統脈絡，尤其是後面兩種，均受到後殖民主義範式³的束縛，這一範式被文化研究領域廣泛應用於批判西方對於前殖民地的美學鑑賞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受到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的可證偽性原則（falseabilidade）啟發，嘗試以最本質的方式把飛歷奇的作品與後殖民主義範式進行對比，對其美學範疇及兩者的關係作出分析。

從方法論的角度而言，本文的分析方法屬於文學社會學的範疇，但這並不意味着對飛歷奇作品的美學分析有所減少，更具體地說，這並不影響對其文學性的評判標準。如果說自從第一種從社會學角度研究文學文本的方法面世以來，上述的爭論就一直存在，並由此把文學評論家、文學理論家與社會學家（甚至

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區分開來，那麼這種緊張的關係已隨着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調和結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之上，提出場域（campo）、文學場域（campo literário）和慣習（habitus）等概念而瓦解。⁴雖然其中的場域概念沿襲了實證主義社會學的傳統，從經濟學的角度繼續將文學或藝術作品理解為一種可被視為商品的客體，但從其象徵意義來說，它並沒有忽視作品的美學維度及自我參照性，亦即重現其產生的社會環境的可能性。這也是文學評論家和文學理論家所珍視的一種和解。

文學場域作為一個系統性的整體，包含着不同利益和權力的博弈。當中一些掌握着經濟資本的既得利益者，往往剝奪了其他人（在文學上）應有的正當權利。根據國家／地區市場在世界經濟中佔據的位置（中心、邊緣或半邊緣），相應的場域也再現了等同的等級制度。另一方面，前殖民地的文學場域與前宗主國的文學場域之間的長久依存關係，在這種等級間距中亦尤為重要。

慣習這一概念，反向制約着文本世界與外在世界之間建立關係的條件。儘管創作是一種個人行為，但作品本身仍能轉化集體記憶中的規訓和品味，並進入到下游（即潛在的讀者群、文學評論家及書商等群體）的理解與鑑賞之中。文學作品由此得以將相關的創造性與集體記憶中的價值觀和美術品味聯繫起來。故此，文學作品不應被視為被動的主體，而應被視為主動的主體。如布迪厄所言：“慣習，正如這個詞所表明的，是一種後天習得的知識，也是一種佔有（haver）……是行動者（agente）的資本。”他還補充說明，無論這種行為是創造性的還是享樂性的。⁵

由此可見，傳播是文學場域存在的關鍵要素。如果不同的參與者之間缺乏交流，就很難將其視為一個整體，亦即一個“系統”。這一概念作為社會控制論的延伸，由托卡·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引入到理論中，並透過

紀念飛歷奇百年誕

尼克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等社會學家以及布迪厄本人傳入社會學領域。

二、對澳門文學活動的思考

為了從系統的角度理解澳門文學活動，就不得不提及筆者在以往的著作中曾提出的質疑，⁶即“文學場域”這個概念是否適用於理解澳門的文學活動。儘管澳門有着大量的中葡雙語出版物，但依筆者所見，兩個最重要的作家群體之間存在一道交流鴻溝：一邊是華語作家群，如廖子馨、鄧曉炯、華鈴（馮錦釗）及姚風（姚京明）；⁷另一邊是葡語作家，當中包括飛歷奇、江道蓮（Deolinda da Conceição）及阿德（Adé，即 José dos Santos Ferreira）等土生作家，還有那些曾經居澳的葡萄牙或其他葡語地區的作家，如庇山耶（Camilo Pessanha）、慕拉士（Venceslau de Moraes）、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潘日明（Benjamim Videira Pires）、賈樂安（Rodrigo Leal de Carvalho）、晴蘭（Fernanda Dias）和歐卓志（Jorge Arrimar）等現代作家，他們一般都被認為同屬這一類別。

基於澳門不同語言群體各自的文學傳統，遏制了組成文學場域原則上應有的正當性（legitimação）和權威性（consagração）機制，導致澳門無法建構出一個文學場域，從而使得澳門土生作家的文學作品，尤其是以葡語創作的作品，若脫離了葡萄牙文學傳統的審視，就難以作出評價。然而，這種比較關係又受制於不平等的條件。如此一來，就導致了兩種展現出從屬性的現象：被審視的文學作品或被定義為僅是帶有地方色彩的一例，或被葡萄牙文學場域既有的、具有正當性及權威性的代表所忽視。飛歷奇曾在訪談中表示經歷過這種漠視，甚至是歧視，他對此深表痛心。當被問及是否與葡萄牙作家有過接觸時，他的回應如下：

沒有。他們既不來找我，我也不主動

去接觸他們。那會讓人覺得我在乞求，而我不會央求任何東西。這不是出於驕傲，我自視平凡，但也必須保護自己的尊嚴。讓他們來找我吧，我們之間的距離是一樣的。我來自澳門，他們來自那裡。⁸

三、葡語系模式

隨着時間的推移，所有葡萄牙殖民地都出現了文化從屬現象。在巴西，對文化從屬現象的反抗潮始於1922年現代主義在聖保羅舉辦的現代藝術周上的出現，繼而延伸到累西腓（Recife）的更大區域範圍內。這場由知識分子和作家作推手，圍繞巴西東北部的歷史文化特性而展開的運動，後來被稱為“巴西區域主義”（Regionalismo Brasileiro）運動。

伴隨着民族主義在非洲的葡屬殖民地興起，反抗潮亦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展開。當中至少有兩個國家——佛得角和安哥拉，在現代主義運動之前，就已出現對文化從屬現象的反抗（佛得角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安哥拉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這些反抗潮，加上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泛非主義和“黑人性運動”（Negritude）等思潮和運動的影響，以及馬克思主義在理論和實踐上對一些國家的獨立進程和解放運動提供的指導，共同加速了民族文學的形成。如果就巴西文學而言，其與葡萄牙文學方面的決裂可說是相當徹底的，但非洲文學的情況卻不盡相同。儘管這些非洲國家在文學領域上已經實現了自主，但它們仍保持對葡萄牙文化的相對依賴性，並延伸至圖書市場本身。

在澳門，由於其在葡萄牙帝國的海外擴張歷史的框架內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沒有出現同類型的運動和抗爭。有別於果阿（包括達曼、迪烏以及達德拉·納加爾哈維利縣）、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或東帝汶等地，澳門事實上從未成為葡屬殖民地。在葡萄牙人抵澳以來的五個世紀中，除了在1849至1976年間處於或近似處於葡萄牙管治之下，⁹澳門一直是由中



圖 2. 在科英布拉大學法學院求學時期的飛歷奇（右二），約 1949 年。（圖片來源：Senna Fernandes 家族檔案）

國和葡萄牙共同參與管治的地區。據歷史學家霍啟昌提出的“澳門模式”描述，明朝末年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官員以一種含糊的方式，容許葡人在澳門居留，這種模式後來被清政府繼續沿用。實際上，在清朝的大部分時間裡，葡人在澳門的生活都被限制在一個保留區域內。¹⁰ 1976 年頒佈的《澳門組織章程》和其後頒佈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1993 年）皆對澳門的行政自治作出相關規定，並正式確立了澳門作為葡萄牙管治下的中國領土的政治地位。1999 年 12 月，中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澳門自此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基於這種歷史特殊性，這一地區沒有原生出任何形式的民族主義，只有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起，在中國內地的民族主義影響下，才開始出現類似的表述和活動，但具體表現為“對西方或對現代性的挑戰”（challenge of the West, or rather of modernity）。¹¹

換言之，前述自民族主義浪潮中催化而來

的美學自主的優勢，並沒有在澳門有所體現。儘管如此，飛歷奇在葡萄牙留學時期與留學生的交往，以及他在科英布拉留學生之家（Casa dos Estudantes do Império）與來自安哥拉、佛得角和莫桑比克等具文化影響力的殖民地學生的接觸，導致他的作品同樣脫離不了民族主義浪潮的影響。他的短篇小說〈蛋家女阿珍〉即為一例，這篇作品在 1950 年科英布拉大學的燃緞帶節（Queima das Fita）獲得了亞美打百花文學獎（Prémio Fialho de Almeida dos Jogos Florais），多年後曾獲安哥拉洛比托的 Cadernos Capricórnio 出版社出版。¹²

〈蛋家女阿珍〉圍繞着水上女子阿珍與葡萄牙水手之間的戀情展開。他們誕下了一個女孩，當葡萄牙水手即將歸國之時，他決定將女兒一併帶走。阿珍考慮到自身所處的生活環境，放棄了其作為母親的權利，順從地接受了伴侶的要求：

紀念飛歷奇百年誕



圖3. 飛歷奇（中）與妻子何香雪（左二）和一眾親友在澳門的生日聚會上合照，1967年。（圖片來源：Senna Fernandes 家族檔案）

啟航的汽笛聲又一次響起。曼努埃爾張開雙臂緊緊地將柔情似水的蛋家女擁在懷裡。阿珍一往情深地注視了他片刻，然後順從地把女兒交给了他，低聲作最後的道別：

“你要保重！多保重啊！……”¹³

故事以這樣一個戲劇性結局作結。雖然這是在澳門發生的故事，但類似的情節也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非洲殖民地上。直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去殖民化浪潮之前，這種情況一直屢禁不止。由此可見，飛歷奇的敘述中貫穿着一種反殖民主義的基調，這與里斯本和科英布拉的留學生之家中，那些致力於民族主義運動的非裔學生所創作的詩歌和文章的基調同出一轍。

安哥拉人民共和國首任總統阿哥斯天奴·

內圖（Agostinho Neto）就是經常蒞臨科英布拉留學生之家的學生之一。在筆者與飛歷奇的一次訪談中，飛歷奇描述了他與阿哥斯天奴·內圖交往的片段：

我認識阿哥斯天奴·內圖。我記得我們（飛歷奇和他的好友）逢星期六、星期日都會去參與阿哥斯天奴·內圖的聚會……誰會想到阿哥斯天奴·內圖有一天會成為安哥拉的明日之星呢？那時我們時常談論他的詩歌，有一次我們一大群人，大概有12人或以上，一起去了阿哥斯天奴·內圖的家……阿哥斯天奴·內圖讓我們坐在他的床上，聆聽卡路士·華倫斯坦（Carlos Wallenstein）朗誦的優美詩歌。¹⁴

除了體現出反殖民主義的基調之外，飛歷

奇的作品也批判了父權主義，尤其是對由傳統戒律和偏見構成的中國父權制作出批判。阿珍最終失去母親的身份，不僅是角色之間不對等的族群和階級關係相互作用下的結果，她作為一個女性，一直生活在對女性極不公平的傳統華人社會中的影響也同樣重要。此外，阿珍還曾作為“妹仔”（奴隸）被賣給粵家主人，這也是造成她那順從的態度的原因之一。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曾言：

在舊中國，官紳階層認為女性的地位比男性低賤。為了讓她明白自己的價值……從七歲起就被禁止與她的兄弟睡在同一張席子上。¹⁵

據其所述，華人的下層社會同樣存在這種習俗，但往往相對寬鬆一些。

在飛歷奇的後期作品中，反殖民主義的元素近乎消失，使得他的寫作更接近葡語國家的標準，但他對中國傳統社會中女性地位低下的批判立場卻一以貫之。在他的遺作《朵斯姑娘》中，女主角萊昂蒂娜·達斯·朵斯（Leontina das Dors）的人生故事開端與〈蛋家女阿珍〉大同小異。正如阿珍一樣，朵斯被賣給了土生家族波利卡波家；不同的是，這場買賣之所以成立，主要是因為她很可能是土生混血兒。雷米奇奧·波利卡波（Remigio Podicarmo）出於族群團結之由，希望她可擺脫奴隸身份，因此決定以族群血脈的名義“買下”她：

我要把她帶走。如果說她不是我的親骨肉，也屬於我的種族。¹⁶

由此可見，族群元素在飛歷奇的敘事中佔有主導地位，但不僅限於此。作者對所有女性角色抱持同樣的敬意，無論她們是華人，如《大辮子的誘惑》中的阿玲；還是西方人，如《愛情與小腳趾》中的維克托利娜（Victorina Vidal）。飛歷奇作品中的所有女性角色都是勇敢和自主的，正如瑪麗亞·曼努埃拉·華來（Maria Manuela Vale）所言，她們對

所在社群的道德規範具有某種顛覆或“越軌”（transgressoras）。飛歷奇筆下的澳門，作為一個體現現代性的空間，既擁抱豐富多元的世界觀，也接受對不同觀念的顛覆，接納那些勇敢而自主的女性捍衛自己權利的行動。¹⁷

四、審視飛歷奇作品的敘事維度

早在 2006 年，筆者就曾撰文試圖從三個維度對飛歷奇的作品進行系統梳理：（一）“殖民陰影”¹⁸ 的消退；（二）自傳性；（三）西方視角下的外部性。¹⁹ 最後一個維度在他對華人社會的描述中起主導作用。這三個維度總結了飛氏作品在美學上的主要成就，下文將作重點闡述。

首先是“殖民陰影”的消退。筆者如今已經沒有像以往那樣看重這一維度，如前所述，飛歷奇的反殖民主義立場與其說是結構性的，不如說是偶發性的，²⁰ 尤其體現於他在科英布拉的留學生之家與其他海外學生的交往。

第二個維度即自傳性，這也許是飛歷奇作品中最重要元素。除了在標題和對話方面表現得最為明顯之外，還體現在他所創作的三部長篇小說中。例如，《大辮子的誘惑》中的阿多森杜（Adosindo）、《愛情與小腳趾》中的弗朗西斯科·弗隆達利亞（Francisco da Mota Frontaria）和《朵斯姑娘》中的弗洛里亞諾·波利卡波（Floriano Policarmo）都是澳門土生男性，他們身上都帶有清晰可辨的飛氏自傳色彩。在每部作品的敘事中，這些角色的人物性格都會有所變化，這在很大程度上與作者自身的人生經驗和不同時期的成熟程度有關。在故事之初，他們的生活總是無憂無慮，經濟條件優越，過着今天我們稱之為“富二代”的生活，絲毫不關心他們身處的政治體制，儘管他們的生活可能受到輕微影響，但他們作為“本地葡萄牙人”的福祉最終亦會受到保障。從飛歷奇筆下對這種行為的明確批判或自我批判中，我們既可以窺見當中的自傳色彩，更可推知當時土生群體對政治的疏離。

紀念飛歷奇百年誕



圖4. 何香雪（右一）與飛歷奇結婚當日於西坑街的家中與女性親友合照，1963年10月26日。（圖片來源：Senna Fernandes 家族檔案）

此外，在小說《大辮子的誘惑》中，主角阿多森杜違背家人的意願娶了一位暹羅女子阿玲，飛歷奇在現實生活中也同樣與一位華人女子成婚，且遭到家人的反對。在《愛情與小腳趾》中，雖然主角弗朗西斯科的經歷與飛歷奇人生軌跡的相似之處並不明顯，但書中的弗朗西斯科是一個經營中型帆船事業的土生家族的後裔，“在十八世紀末葉及十九世紀的前半個世紀，弗隆達利亞家族無論在中國各港口商業活動中還是在同海盜的鬥爭中都是赫赫有名的”。²¹而在筆者與飛歷奇進行的一次訪談中（2007年），他對自己的家族背景曾有過以下描述：

我的家族歷史可以追溯至葡萄牙。我不知道初到這裡的祖先的名字。可能叫

佩德羅（Pedro）？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十八世紀時曾在這裡居住，並組建了家庭，生兒育女……我們是十八世紀塞納·費南德斯（Senna Fernandes）的後代。²²

就《朵斯姑娘》中的人物弗洛里亞諾而言，同樣可以與作者的人生經歷產生連結，尤其是弗洛里亞諾原本打算在科英布拉學習法律，然後帶着學位回到故土，打開其他專業的大門。值得注意的是，弗洛里亞諾這個無法實現的願望，飛歷奇卻在現實中達成了。

整體而言，飛歷奇主要透過兩個面向來塑造這些人物：其一是無憂無慮的性格（在某些情況下也可以說是輕率），其二是對社會責任

的擔當。作者藉此反映出一種社會關懷，這種關懷不僅是在自傳性的維度有所體現，更貫穿了整部作品，在其他方面也十分明顯，表達出作者對澳門華人群體的親切感和共情，以及他對中國內地的關切態度。由此可見，以土生作為溝通葡萄牙人與華人社群的中間人，既是因為這有利於增強澳門社會的凝聚力，也因為土生社群一直（並仍持續地）受到某種異質性的凝視，故而藉此尋求土生社群的正當性。換言之，飛歷奇以及其他土生作家，如江道蓮或阿德的寫作活動，都是一種尋找母國、尋找家鄉（Heimat）²³的過程——如同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提出的概念——並且符合飛歷奇對自身身份認同的重要參照：若葡萄牙是他的母國，那麼澳門就是他的家鄉。

至於第三個維度，則是飛歷奇以傳統的西方視角對華人社會施加的凝視。相對於庇山耶和慕拉士而言，飛氏作品的敘事手法更帶有一些人類學色彩，更接近小說家賽珍珠（Pearl Buck）的作品風格，後者的小說對二十世紀上半葉西方塑造的中國形象有重要影響。在當時的西方人眼中，中國是一個既自卑又崇敬祖先的古老文明，與西方的技術發展和進步理念格格不入。²⁴

飛歷奇和江道蓮在以他者視角凝視傳統華人社會這一件事上，可謂相伴而行。²⁵收錄在《南灣》中的〈華商情仇〉是最能體現這種他者敘事的作品之一，飛歷奇在此類敘事的故事衝突中，不乏對小說的文本世界表現出某種共情，正如賽珍珠的小說基調。〈華商情仇〉的故事背景設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作者／敘述者²⁶在廣州和澳門之間的一次海上航行中，初次遇上故事的主角鄭少爺——“一位身材瘦高的華人男子，他戴着一副深色眼鏡，靠在輪船的舷圍上”。²⁷

鄭少爺在兩個家庭的協商下，與“珠江三角洲船務公司的老闆梁先生的千金”成婚。²⁸某日，鄭少爺發現妻子竇盈與一位著名粵劇演員戲王有私情，他知道戲王生性好色，因此僱

了一名患有癲瘋病但外表無任何病跡的女子勾引他，“從外表看上去，那姑娘像一個美麗的紅蘋果，但她的整個軀體內部開始腐爛了”。²⁹最終鄭少爺的復仇計劃成功了，因為人們害怕被傳染，所以這對染上癲瘋病的情人只能被困在珠江邊的隔離區，“漸漸地他們的蹤跡消失了，同那些悲慘的人們匯集在一起”。³⁰

此外，飛歷奇作品的他者敘事，還體現在他對華人女性角色的塑造與描寫中，包括來自上流社會的竇盈和身為奴僕的阿英。她們與《愛情與小腳趾》中的女主角維克托利娜截然不同，作者對她們的心理描寫更加模糊和公式化。與之相對，維克托利娜與其他來自土生社群的典型人物一樣，有着豐富又生動的個性，且具有個人意志。這些特點表明作者自身更接近後者這類角色所代表的社會階層，維克托利娜正是作者熟悉的社群中的代表性角色，因此飛歷奇尤其擅於對這類人物的描寫。

五、後殖民範式

回到以澳門文學場域、葡萄牙文學傳統中的東方主義傾向分支³¹和葡語系地區文學傳統³²來界定和分析飛氏作品的討論。筆者認為此處有必要對後殖民主義作一些辨析。按照本文的論點，此概念對於探討葡萄牙和葡語系地區文學傳統的價值極具意義。

後殖民主義的概念最初有兩個基本涵義：其一是與歷史分期有關的廣泛涵義，其二則是一個更抽象、浮動的概念，有時可被理解為一種範式或理論。無論是基於何種涵義，後殖民主義都已成為人文社科領域的一個重要思潮和認識論，尤其是對盎格魯—撒克遜和前宗主國—殖民地世界的一系列概念、研究過程和方法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後殖民主義的目標之一，是恢復那些在歷史長河之中沒有發言權的群體的權利。這一願景在本質上以辯證和知識結構為主軸，結合泛非主義和“黑人性運動”等思潮和運動進程的推動，發起對認識論的重塑，將那些原本在世界歷史中被剝奪了主體性

紀念飛歷奇百年誕



圖 5. 在辦公室中的飛歷奇，1967 年。（圖片來源：Senna Fernandes 家族檔案）

的失權群體的生活和思想經驗，重新引進到思想和科學領域的知識體系之中。

對藝術和文學作品的批評不僅沒有被這種認識論上的轉向拋棄，更是這一轉向的先驅。薩特（Jean-Paul Sartre）的〈黑色的俄耳甫斯〉（“Orphée Noir”）被認為是後殖民主義的奠基文本之一，該文是由利奧波德·塞達爾·桑戈爾（Léopold Sédar Senghor）選編並於 1948 年出版的一本非洲和馬達加斯加詩歌選集的序言。³³ 也有一些後殖民主義的倡導者認為法蘭茲·法農（Frantz Fanon）的《被詛咒的地球》（*Os Condenados da Terra*，1961 年）和薩義德（Edward Wadie Said）的《東方學》（*Orientalism*，1978 年）更應放在首位薩特在該篇序言中提出了“反種族主義的種族主義”（racismo anti-racista），

作為對抗與殖民主義相關的種族主義的一種方式；而法蘭茲·法農則撰文譴責殖民主義和歐洲擴張主義對被殖民者造成的去人格化（despersonalizantes）影響。³⁴ 此外，薩義德還批判了西方科學和思想領域以一種東方主義的方式建構知識體系，指出這在加深對異域社會和文化的認知的同時，貶低和剝奪了這些文化當中有利於進步的一面。

從這些意義上理解的後殖民主義，歸根結底是對文化場域中長期存在的殖民主義霸權的批判，是對馬克思主義者已經（並仍然）稱為“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o）現象的一種更為狹義的複述。當中隱含的文化霸權主義以一種從屬性的形態出現：一方面表現為前殖民地與前宗主國在藝術和文學場域中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前宗主國對前殖民地

的文藝創作者的正當性的否認，最終前宗主國在這場不平等的博弈中（套用馬克思主義的表述方式）將自身定位為中心場域。

如果說後殖民主義在某程度上影響了循葡萄牙和葡語系地區的文學傳統脈絡，對飛歷奇的作品進行定位和評價，那麼相較於與該範式有關的其他路徑，這種關係可謂更加複雜和困難。這種窘境源於澳門這片土地的特殊性，即葡萄牙的管治只持續了一段有限的時間，而且是以一種介乎正式與非正式之間的方式進行。儘管葡萄牙語曾是（甚至目前仍是）官方語言，但它在澳門從未擁有語言霸權的地位，甚至連中間語（língua intermediária）也不是，發揮這一作用的是土生社群使用的克里奧爾混合語——土生土語。在地緣政治方面，中國在澳門的所有歷史時期中從未缺席，這意味着中國一直深刻地影響着澳門的發展態勢。所謂的種族主義和去人格化問題，在澳門並沒有引起像非洲甚至拉丁美洲那樣的重視。儘管一些克里奧爾人和西方人也曾試圖貶低中國文化，但至少就葡萄牙的海外擴張歷史而言，這種貶低遠遠沒有達到非洲和美洲地區所遭受的歧視程度。事實上，歐洲殖民主義在亞洲的很大一部分地區，特別是在中國，都對當地的社會和文化內驅力影響不大。因此，筆者認為以後殖民主義範式分析及評價飛歷奇的作品並沒有甚麼價值。

結語

飛歷奇是一位獨特的作家，他的作品自成一派。本文受到卡爾·波普爾的否證論，尤其是可證偽性原則的啟發，經過反覆的試誤性實踐，筆者相信在文章開頭提出的命題是正確的：飛歷奇是一位有價值的作家。他視自己為一位澳門作家，其作品以澳門為創作中心，並藉此表達出他所屬的土生社群的生活經驗和憂慮；同時，他是一位葡語文學創作者，也是一位葡語系地區寫作者。總括而言，前述種種都無法掩蓋真實的飛歷奇的多重面向：他是一位出色的故事講述者、一位獨特的小說家、一位機智

的“對話構建者”——他曾多次向筆者表示，這是他在小說中最喜愛的一種文體。

飛歷奇，後會有期！

附：本文葡語原文刊載於《文化雜誌》（外文版）第73期，參見 José Carlos Venâncio, "Da Perspectiva da Sociologia da Literatura: 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 — Um Escritor por Si Próprio", *Review of Culture* (International Edition), no. 73, 2023, pp. 48–61.

註釋：

1. crioulo 一詞原指在海外屬地長大的歐洲後裔或在當地土生土長的混血兒（他們被稱為克里奧爾人），後又被用於指稱他們所使用的包含不同語言成分的混合型語言。——譯者註
2. 訪談實際上錄製了四次，分別於1997年6月、2002年1月、2006年6月和2007年3月進行。由於這四次訪談的內容具有連貫性，且出於實際需要與方法上的考量，筆者在本文僅引用了2007年的訪談內容。在整個訪談的過程中，筆者會把每次錄製好的內容交予訪談對象確認，以便最後整理出一個更具代表性的訪談成果。
3. 儘管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對“範式”(Paradigma)的概念定義，與道格拉斯·埃克伯格(Douglas Eckberg)和萊斯特·希爾(Lester Hill)等人存在分歧，但共同的核心概念為“範式即認知的本質及其所處的群體結構”。參見 Eckberg, Douglas Lee, and Lester Hill. "The Paradigm Concept and Sociology: A Critical Review."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4, no. 6, 1979, p. 926.
4. 這些概念也適用於政治和經濟等其他領域。有關這些概念的起源，參見 Bourdieu, Pierre. *O Poder Simbólico*, traduzido por Fernando Tomaz, DIFEL, 1989; Bourdieu, Pierre. "Le champ littérair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no. 89, 1991, pp. 4–46; Bourdieu, Pierre. *Die Verborgenen Mechanismen der Macht*, Margareta Steinrücke Schriften zu Politik & Kultur. Vol. 1, VSA-Verlag, 1992.
5. Bourdieu, Pierre. *O Poder Simbólico*, traduzido por Fernando Tomaz, DIFEL, 1989, p. 61.
6. Venâncio, José Carlos. "O Escritor do Inconformismo Macaense: 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 *Tempo Tribio*,

紀念飛歷奇百年誕

- vol. 1, no. 1, 2006, pp. 78–92; Venâncio, José Carlos. "A Literatura Macaense e a Obra de 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 Um olhar Histórico-sociológico." *Revista de História das Ideias*, vol. 29, 2008, pp. 691–702.
7. 姚京明曾任澳門大學葡文系系主任，也以葡萄牙語寫作，是這一類別中的一個例外。
 8. 訪談中的原表述為：“Não tenho. Eles não me procuram a mim e eu não os procuro a eles. Isso ia parecer que eu estou a mendigar e eu não mendigo nada. Não sou orgulhoso, sou uma pessoa simples, mas tenho de manter a minha dignidade. Eles que me procurem, nós estamos à mesma distância. Eu sou de Macau e eles de lá.”
 9. Pina-Cabral, João de, and Nelson Lourenço. *Em Terra de Tufões: Dinâmicas da Etnicidade Macaense*.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3, p. 27; Hao, Zhidong. *Macao History and Society*.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40.
 10. 事實上，這種情況並非澳門獨有。例如在重商主義（Mercantilismo）時期，在非洲西海岸的達荷美王國烏達市就發現了這種情況，當時包括葡萄牙人在內的外國商人也被限制在特定區域。
 11. Yahuda, Michael. "The Changing Face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Dimensions of Statehood." *Asian Nationalism*, edited by Michel Leifer, Routledge, 2000, p. 25.
 12. Cadernos Capricórnio 是一家致力於安哥拉民族主義運動（尤其是以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為代表的民族主義運動）的反殖民主義出版社，由安哥拉文學界的一位重要詩人阿爾達·拉拉（Alda Lara）的繆夫奧蘭多·德阿爾布克爾克（Orlando de Albuquerque）主導。
 13. Senna Fernandes, Henrique de. *A-Chan, A Tancareira*. Cadernos Capricórnio, 1974, p. 20. 中譯文參見飛歷奇：〈蛋家女阿珍〉，載飛歷奇著，李長森等譯：《南灣》，澳門：澳門土生教育協進會，2003年，頁67。
 14. 訪談的原表述為：“Eu conheci o Agostinho Neto. Lembrome de andarmos [o HSF e o irmão] no grupo de Agostinho Neto aos sábados e aos domingos. [...] Quem diria que Agostinho Neto seria o homem do futuro de Angola. Falava-se das suas poesias e houve um dia em que fomos para a casa do Agostinho Neto, para a pensão dele. Éramos um grupo grande, uns doze ou mais [...]. O Agostinho Neto chamou-nos para nos sentarmos na cama dele e ficámos a ouvir versos, poesias lindíssimas recitadas pelo Carlos Wallenstein.”
 15. Gomes, Luís Gonzaga. *Curiosidades de Macau Antiga*.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6, p. 159.
 16. Senna Fernandes, Henrique de. *Os Dores*.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2012, p. 19. 中譯文參見飛歷奇著，喻慧娟譯：《朵斯姑娘》，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5年，頁24。
 17. Vale, Maria Manuela. "A Escrita da Cidade e a Narrativa Macaense." *Revista de Filologia Românica*, Anejos, vol. 2, 2001, p. 313.
 18. “殖民陰影”一詞在此處加上了引號，以強調上文提到的葡萄牙人居澳的幾個世紀中的特殊處境。
 19. Venâncio, José Carlos. "O Escritor do Inconformismo Macaense: 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 *Tempo Tribúio*, vol. 1, no. 1, 2006, pp. 78–92.
 20. 這並不代表飛歷奇的作品中沒有反對薩拉查政權的言論。例如，他對利宵學校聯合會在1941至1942學年上任的新校長以及葡萄牙青年團（Mocidade Portuguesa）的成立均表示不滿。參見 Senna Fernandes, Henrique de. *O Cinema em Macau: desde o Início do Século XX até à Décade de 30*.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2010, p. 223.
 21. Senna Fernandes, Henrique de. *Amor e Dedinhos de Pé*.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4, p. 13. 中譯文參見飛歷奇著，喻慧娟譯：《愛情與小腳趾》，澳門：澳門文化司署、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4年，頁8。
 22. 訪談中的原表述為：“A origem da minha família remonta a Portugal. Não sei qual era o nome do meu antepassado que veio para cá. Não sei se era Pedro? O certo é que ficou cá no século XVIII e fundou família, teve filhos... Nós somos descendentes desse Senna Fernandes do século XVIII.”
 23. 作者在原文中使用的“Heimat”一詞為德語單詞，意為“家”或“祖國”；布洛赫所提出的“家鄉”則是一種烏托邦式的想像中的家園。——譯者註
 24. 事實上，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對西方來說都是謎一般的存在。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他的《宗教社會學文集》（*Gesammelte Schriften zur Religionssoziologie*，1904至1920年）中，可謂最接近揭示中國文化與科學技術發展的關係與潛力。然而，有別於他對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論述，韋伯未能明晰儒家思想中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因素，尤其是傳統價值。隨着二十世紀的後25年，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亞洲四小龍”（即中國香港、台灣，以及韓國和新加坡四個經濟體）經濟高速發展，這一立場開始受到反思。時至今日，中國的發展態勢更使得重新審視西方對中

國的既有看法顯得尤為重要。

25. 江道蓮之子江連浩 (António da Conceição Júnior) 在為《旗袍》第四版作序時，曾表示並不完全贊同這一觀點，但並沒有作進一步解釋。參見 Conceição, Deolinda da. *Cheong-Sam: A Cabaia*. 4th edition,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and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995, p. 12; Brookshaw, David. "Literatura Macaense." *DITEMA: Dicionário Temático de Macau*, edited by Rui Martins et al., vol. III, Universidade de Macau, 2011, p. 879.
26. 這篇短篇小說以他慣常的開篇方式展開，在某些情況下具有自傳體的性質，就像收錄在《望廈》中的故事。筆者想特別指出，〈聖誕的一個奇蹟〉（“Um Milagre de Natal”）、〈茉莉花〉（“Yasmine”）和〈舊恨不寐〉（“Ódio Velho não Dorme”）三篇，從敘事結構的角度而言，是他最為傑出的短篇小說作品。這種近似自傳體的寫作手法強化了飛歷奇作為作家的一個最重要的面向：故事講述者。
27. 參見 Senna Fernandes, Henrique de. *Nam Van: Contos de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7, p. 104. 引文參見飛歷奇：〈華商情仇〉，載飛歷奇著，李長森等譯：《南灣》，澳門：澳門土生教育協進會，2003年，頁143。
28. Senna Fernandes, Henrique de. *Nam Van: Contos de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7, p. 108. 中譯文參見飛歷奇：〈華商情仇〉，載飛歷奇著，李長森等譯：《南灣》，澳門：澳門土生教育協進會，2003年，頁150。
29. Senna Fernandes, Henrique de. *Nam Van: Contos de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7, p. 142. 中譯文參見飛歷奇：〈華商情仇〉，載飛歷奇著，李長森等譯：《南灣》，澳門：澳門土生教育協進會，2003年，頁203。
30. Senna Fernandes, Henrique de. *Nam Van: Contos de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7, p. 105. 中譯文參見飛歷奇：〈華商情仇〉，載飛歷奇著，李長森等譯：《南灣》，澳門：澳門土生教育協進會，2003年，頁213。
31. 筆者認為這一文學傳統不應與殖民文學混淆，葡語世界的殖民文學實際上僅限於以非洲殖民化為主題的文學作品。
32. 即那些符合規範葡語的文學作品。
33. 該文是利奧波德·塞達爾·桑戈爾選編的《法語新詩選集》（*Anthologie de la Nouvelle Poésie Nègre et Malgache en Langue Française*）的序言，薩特在文中稱“反種族主義是通往廢除種族差異的唯一道路”（ce racisme antiraciste est le seul chemin qui puisse mener à l'abolition des différences de race）。這一立場有別於馬克思主義的既有論述，啟發了關於種族主義問題的思考，促進了後殖民範式的基本假設之一的形成。參見 Sartre, Jean-Paul. "Orphée Noir." *Anthologie de la Nouvelle Poésie Nègre et Malgache en Langue Française*, editado por Léopold Sédar Senghor, Quadrige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7, p. XIV.
34. 法蘭茲·法農的有關論述可見於《大地上的受苦者》（*Les Damnés de la Terre*，1961年）及《黑皮膚，白面具》（*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1952年）等著作。——譯者註